

西方汉学中汉字注音一瞥^{*}

王仲男 方环海

《汉字文化》杂志在 2013 年第 5 期刊载了首都师范大学宋均芬教授的论文《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以下简称宋文)。文中介绍了古今中外诸多汉字注音方案,包括在古代使用的如“读若”和“反切”等传统注音方法、近现代使用的如利玛窦方案和威妥玛式拼音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注音符号以及当下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等。从汉字注音的最初诞生,发展直到成熟,宋文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介绍和梳理,阅后受益匪浅。

当然,也许是受篇幅所限,宋文对汉字注音前世与今生的介绍中,将重点放在了“今生”,而“前世”部分,则稍有省略。关于“汉字注音的前世”,事实上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宋文中提到,近现代注音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类是罗马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式,另一类是注音字母式,而关于第一类,宋文的介绍当中主要介绍了利玛窦方案和威妥玛式拼音。

事实上,从利玛窦注音方案到威妥玛式拼音和邮政式拼音的产生,其间逾 300 年,甚至在利玛窦注音方案产生之前,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出于种种目的,已经在不断地尝试破解汉语这种古老又陌生的语言。自 16 世纪中后期起,在西方有相当多的汉学家编著过汉语相关的字典、词典、韵书和语法著作,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汉语设计了自己的注音方案。可以说,从利氏拼音到威氏拼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学者关于汉语尤其是汉语语音认知的演进过程。其中,许多学者及其汉语论著,对汉语研究做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利玛窦和威妥玛。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海外汉学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一些尘封在国外图书馆和资料室的论著正在逐渐被国内学者发现并研究,有关西方汉学的研究迅速丰富,而在汉语语音领域,自利玛窦到威妥玛之间的汉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从不为人知也逐渐走入学者们的视野。本文拟对利玛窦方案出现之前和利-威之间出现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音方案进行梳理,以之对宋文做出补充。

一、19 世纪以前西方汉语注音概况

虽然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我们国人制定的,但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并不是当时的学者凭空编写出来的,而是也处在罗马字母注音汉语历史的轨迹之中。几百年间,包括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方案诞生以及演进和发展,可以说,都是西方学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初才有所改变。

(一) 汉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的起源

掌握一种语言,首先就要掌握这种语言的发音,而当时中国的韵书几乎都使用反切的方法为汉字注音。反切在中国音韵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然而,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宋文中提到,反切的经典教材《广韵》中,用来表示声母的上字有 452 个,表示韵母的下字则多达 1200 多个。试想对于从未接触过汉语的西方传教士来说,要掌握这一千多个汉字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这种方法不易于进一步的传播。也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才催生了传教士开始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为汉语注音。

^{*}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YJAZH021)和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2B149)的阶段性成果。

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究竟始于何时?宋文引用了罗常培先生的著作《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中提到的利玛窦注音方案,认为利玛窦方案是西方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最早的一套方案。事实上,这一点并不准确。

利玛窦注音方案诞生于16世纪末,而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并非偶然。16世纪初,西方国家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海上航线,商人、使臣和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来到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也开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序幕。其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播福音,势必要掌握汉语,特别是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来到中国后,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要求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①而在此之前,西方人对汉语的认识,只停留在一些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作品和书信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之中,16世纪中期之后,开始有部分传教士主动学习汉语。在当时,要寻找到通晓西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才几乎不可能,早期的传教士学习汉语十分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先行者们如利玛窦、罗明坚等人,努力掌握汉语不仅仅是有助于他们在华传教,对后来的传教士更有着非凡的意义。

虽然该方案现在习惯称为“利玛窦方案”,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利玛窦方案的诞生并不是利玛窦一个人的功劳,甚至可以说,利玛窦在该方案的产生过程中的贡献并不是最大的。利玛窦方案,源于利玛窦所著的《西字奇迹》,这也是汉语史上第一份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汉字读物。《西字奇迹》编著于1605年,而在这之前,有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已经使用一套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这就是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编著的《葡汉辞典》。一般认为,《葡汉辞典》编著于1583年到1588年,然而20世纪初,人们并不知道这一部作品的存在,所以当时有学者追述罗马字母注音汉语体系时,仅仅研究到利玛窦《西字奇迹》,如罗常培(1930)提到“本篇根据的材料,除去《西儒耳目资》^②以外只有《程氏墨苑》^③里利玛窦的注音”。直到1934年,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史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中发现了一部手稿。其中32页-165页是这部手稿的主体,为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词典,后被德礼贤命名为《葡汉辞典》,而辞典以外的部分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神学、天文学知识等,其中有一个小册子《宾主问答私拟》^④,作为传教士学习日常会话之用。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葡汉辞典》基本已经可以认定为最早使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注音的作品,其中注音方案也可以认定为汉字罗马字母注音方案的起源。

《葡汉辞典》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合作编写的一部作品,但是利玛窦方案却被认为出自于《西字奇迹》而非《葡汉辞典》^⑤,主要是因为该辞典编写过程中,罗明坚承担的部分更大。罗明坚同利玛窦一样,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他加入教会之前就拿到了两个法学博士学位,1579年到达了中國,并遵从范礼安神父的要求,开始努力学习汉语。他天赋极高,并且自身性格坚忍不拔,因而来了几个月便能认识许多汉字,三年后就可以使用中文写作了(张西平2001)。除了《葡汉辞典》以外,他也是最早把儒家经典译成西方语言的学者,翻译了《三字经》和《大学》等作品;不仅如此,罗明坚写出了西方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并在西方绘编了第一幅中国地图集。

由于利玛窦的巨大影响,人们往往忽略了罗明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罗明坚的研究深入,其历史地位也得到了肯定,张西平(2001)曾经称之为“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利玛窦在1582进入中国时,实际上就是受到了罗明坚的举荐和邀请,而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时,罗明坚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据此,谭慧颖(2008)考证罗明坚为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第一人,张西平(2001)也认为“《葡汉辞典》主要是罗明坚所编,利玛窦只是作为助手出现的,《葡汉辞典》中的中文语词部分也可能是罗明坚亲自撰写”。杨福绵(1995)称《葡汉辞典》整理出来的注音方案为“罗明坚方案”,区别于以《西字奇迹》为代表的“利玛窦方案”。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汉字的罗马字母注音始于罗明坚和他的“罗明坚方案”。该方案包括了24

个声母和 46 个韵母（见附表）。当然，虽然据有首创之功，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罗明坚系统的诸多不足。杨福绵（1995）提到它在声母和韵母拼写法上尚未定型，甚至有些混淆的地方，经常出现一音多号的现象，另外，罗氏系统没有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⑥。相比来说，宋文介绍的利玛窦方案，则较之罗明坚方案有了很大的改进，最主要的就是“-”、“ˊ”、“ˋ”、“ˌ”、“ˍ”来表示五个声调以及用 c 上标来表示送气音。

罗明坚和利玛窦是西方人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最早尝试者，他们所设计这两套注音方案的过程中，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⑦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传教士，不仅是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更是早期西方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中关于汉语语音研究的先行者。

（二）金尼阁系统与其它汉语注音方案

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后，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是汉字注音史上另一位重要的人物。金尼阁是法籍耶稣会士，1577 年生于尼德兰佛兰德斯的杜埃城^⑧，于 1610 年利玛窦逝世之后到达澳门，并于 1611 年到达南京，正式开始自己的传教生涯。在人生最后几年，金尼阁定居杭州，于 1626 年在王徽、韩云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编著西方人的第一部汉语语音韵书——《西儒耳目资》。

《西儒耳目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译引首谱》，第二部分《列音韵谱》，第三部分《列边正谱》。其中，《译引首谱》主要是理论部分，《列音韵谱》是音序字典，《列边正谱》是形序字典。在《译引首谱》部分记录的语音理论，主要围绕两个活图——“万国音韵活图”和“中原音韵活图”展开。万国音韵活图是由七个同心圆组成的图，中间相同的五圈是 29 个字母，最外圈是发音近似的汉字，最内圈是声调。中原音韵活图是六个同心圆组成的图，六个同心圆分为三组，分别为韵母圈，声母圈和声调圈。这些同心圆转动起来，便形成了各种各样韵母声母和声调以及汉字的组合。

《西儒耳目资》在历史上的地位，除了上文中提到是第一部西人所著汉语韵书之外，正如宋文中也提到过，它也象征着西方人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走向成熟（罗常培 1959）。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也比较早，20 世纪 30 年代起，罗常培就着手研究。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这部作品本身和其中的注音方案比较成熟，研究价值较高，也能较好地研究当时的汉语语音提供有力的参考，因而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二是《西儒耳目资》成书的过程，有当时中国的学者参与其中，正如谭慧颖（2008）认为，这部作品针对的对象并不是“西儒”而是“中儒”。该作品在诞生以来，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也引起了重视，加上在中国出版，不至于佚失。

关于《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语音系统，被称为“金尼阁系统”。可以说，此套系统与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方案一脉相承，罗常培认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系统与利玛窦注音相比“彼此间不过大同小异，并没有相差很远的地方”（罗常培 2004）。金尼阁方案包括 20 个声母和 50 个韵母，其中韵母部分、送气符号、声调符号和次音符号和利玛窦方案基本保持一致，区别最大的在于声母（见附表）。另外，罗明坚和利玛窦系统出现过的一音多号和一号多音现象，在金尼阁系统中基本杜绝。谭慧颖（2008）认为金尼阁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学者语音习惯，将罗明坚和利玛窦认为有区分而实际上中国人认为没有区分的一音多号和一号多音都合并为一音一号，是一种“中式注音”。

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三人，是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最重要的三名汉学家。自罗明坚、利玛窦的《葡汉辞典》起，由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改进，又经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进一步完善，开启了西方人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漫长的探索道路。

除金尼阁以外，17 世纪又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西方汉学家，将罗氏、利氏和金氏注音系统继承和发展了下去。总体来说，主要有多明我会士迪亚斯（Francisco Dias）和他编著的《汉字卡斯蒂利亚语释义词汇手册》、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和他编著的《大中国志》、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他编著的著作《中国文法》、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

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⑨的翻译注音、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和他编著的《中国新史》、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 (António de Gouveia) 和他编著的《无罪获胜》、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万济国 (Francesco Varo) 和他编著的《华语官话语法》^⑩、意大利圣方济各会士叶尊孝 (Brollo Basilio) 和他编著的《汉字西译》等诸多注音方案, 各个方案语音体系的特点, 基本上或继承了利玛窦方案, 或继承了金尼阁方案^⑪。

在 17 世纪西方学者研究汉语的著作井喷式地出现, 事实上与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稳步展开有着密切关系。从利玛窦在华活动的成功, 到汤若望在清廷任显职,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顶峰, 从上文中的有关著作和注音方案来看, 也能明显看出耶稣会士的贡献最大。有学者说, 天主教传道的开展尤其要感谢耶稣会 (Giorgio Casacchia, Mariarosaria Gianninoto, 2011)。然而, 这种繁荣之下其实隐藏着隐患。比如, 在清廷任职的传教士受到其他大臣的嫉妒,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后, 也与耶稣会产生了摩擦 (德礼贤 1934)。1616 年利玛窦死后六年, 便爆发了南京教案^⑫, 曾德昭、庞迪我都曾牵连其中。之后, 利玛窦生前一贯坚持的“合儒排佛”的文化适应策略开始出现松动, 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 更是开始了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不仅仅引发了清政府对在华教会的严厉限制, 各教派之间的互相斗争, 更是给天主教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之下, 进入 18 世纪, 以传教士为主力的西方学者在汉语研究上步履维艰, 进展缓慢^⑬, 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领域里也基本停滞不前, 整个 18 世纪并无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以此为分期, 直到 19 世纪初期, 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才有了新的突破。

二、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西方汉语注音概况

(一) 承前启后的马礼逊汉语注音方案

19 世纪初, 西方学者对汉语的研究重新繁荣。在这一时期, 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英国汉学家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作为第一位进入大陆的天主教新教传教士, 在华 27 年, 直到 1834 年在广州病逝。马礼逊著作颇丰, 在其一生中, 除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以外, 还有汉语语言学著作《通用汉言之法》、关于广东方言的《广东省土话字汇》, 同时, 马礼逊也是将《圣经》译成汉语的第一人, 另外, 他创立了培养汉英双语人才的英华书院和新加坡书院, 是英国汉学的奠基人。

相比于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等人, 国内对马礼逊的研究, 尤其是汉语方面的研究开始的相对来说较晚。周有光较早研究马礼逊与汉语语音, 在有关论著中提到马礼逊是利玛窦、金尼阁方案和威妥玛方案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 并指出在当时对马礼逊的研究还比较少 (周有光 1960)。近年来, 马礼逊对中西交流起到的重要贡献逐渐被认可, 对他的研究也迅速丰富, 涵盖了语言、历史、政治和哲学等诸多方面。

《华英字典》是马礼逊受英国伦敦教会指派起手编纂的。从 1815 年第一卷在澳门出版, 直到 1823 年才全部出版完成。该作品一共三部分, 分六卷, 收四万余字。第一部分为汉字字典, 共三卷, 按部首排列; 第二部分为《五车韵府》^⑭, 共两卷, 是以音序排列的汉英字典; 第三部分为《英华字典》, 是以英文对照汉语查找的字典。其中, 第二部分《五车韵府》因为是音序字典, 正文里的字也是按照读音划分的, 因而更适合作研究材料, 马礼逊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也主要体现在此。

《五车韵府》的音韵表分为三个, 第一个是方言音韵表: 使读者可以通过广东方言的读音查询汉字, 在每一个广东方言读音的后面, 给出了在《五车韵府》中所对应的读音。第二个表是“手稿”中记录的音阶与《五车韵府》中所对应音阶的对照表。关于这个“手稿”, 马礼逊提到是从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得到的, 是威廉琼斯爵士的遗产, 也是编纂字典时所参照的蓝本, 而“手稿”到底是

如何一部作品,则没有提到。据杨慧玲(2012)考证,这部手稿应该是叶尊孝所著汉拉词典的一个抄本。第三部分,是音序的检字表。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所使用的注音系统包括了25个声母和58个韵母(见附表),在音韵表中一共列出了411个音节。但是,该音韵表中并未区分送气音,因而如果将送气音区别开来的话,总结起来一共有538个音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马礼逊在《华英字典》第一部分前言中明确指出该字典记录的是南京官话,但在《五车韵府》的说明部分特别讲到了一些南京官话和北京方言语音上的差异。考虑到马礼逊终其一生都在广东地区活动,几乎不可能用到当时的北京话,那么在字典中提到这些,事实上也有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北京官话已经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礼逊的字典在中国出版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来自于西方诸国的汉学家围绕《华英字典》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但这并不能掩盖这部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华英字典》是16、17世纪西方人汉语研究的继承,也是19世纪再次繁荣的奠基之作。

(二) 卫三畏的汉语注音系统及其影响

马礼逊之后,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是该领域另一位重要人物。卫三畏1812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教徒家庭。19世纪20年代,马礼逊邀请美部会入华继续在华的传教事业。在这种背景下,卫三畏于1833年到达广州传教。

卫三畏在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汉语,并与四十年代开始出版汉语教材,先后编写了《拾级大成》、官话词典《英华韵府历阶》和广东方言词典《英华分韵撮要》等作品。1863年,卫三畏着手编写大型字典《汉英韵府》,于1874年在上海出版。回国以后,于1877年担任耶鲁大学首任汉文教授。卫三畏一生在华四十余年,除了汉语著作,他还参与编写了《中国丛报》,编写并修订了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国总论》。他在对中国的研究上贡献巨大,是美国汉学的开山鼻祖。

卫三畏研究汉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大型字典《汉英韵府》。《汉英韵府》的注音方案以及字的排列,参考了一本叫《五方元音》的字典并将其改造。之所以以《五方元音》为蓝本,是因为卫三畏参考了马礼逊等人的字典以后,认为用中国人的音节标准更好(孔陈焱2010)。他在扩充了《五方元音》里的声韵系统后,选定了35个声母和39个韵母(见附表),共确定了532个音节(昌梅香2013)。卫三畏的词典连同他设计的注音方案,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卫三畏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音方案就是宋老师在文中介绍的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方案。当然,19世纪阶段编写过汉外字典的汉学家并不止上述几位,其他一些学者也为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方言方面。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著的《汉英字典》和研究福建方言的《福建方言词典》、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研究上海方言的著作《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这些著作,都是我们研究当时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珍贵参考

三、西人汉语注音的演进

自罗明坚、利玛窦起,西方人尝试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为汉字注音,直到威妥玛-翟理斯方案问世,逾300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对汉语也从只言片语中混沌模糊的记载到能利用科学的教材、词典和参考书籍理性地学习、研究和掌握并使用汉语。从初创到成熟,注音汉字这一项艰难工作的展开也伴随着自身的特点。

(一) 语音描写视角的转变

最鲜明的一点是,记载注音方案的著作所使用的语言,从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罗曼语族语言向以英语为主转变,特别是以19世纪为分期。19世纪以前,贡献最大、著作最多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如利玛窦、罗明坚、卫匡国以及对马礼逊编著作品提供了巨大参考的叶尊孝,而传世作品中以葡萄牙语居多,如《葡汉辞典》和葡式罗马字的《西儒耳目资》^⑨。19世纪之后,贡献较大的汉学家则多来自英法美等国家,著作也大都围绕英语编著。如马礼逊、翟理斯和威妥玛都来自英国、卫三畏

来自美国,《华英字典》、《汉英韵府》都是英汉辞典。

这种语族的转变在注音方案中也体现的很明显。例如,早期的几位汉学家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在表示 [ts] 这个音时,选取的罗马字母都是葡萄牙语中比较常见的 Ç,而自马礼逊起,开始选择英语中更多使用的 [ts]; 表示 [ŋ] 的音,19 世纪以前的汉学家包括罗、利、金和叶尊孝等人都选取的是葡萄牙语中发音 [ŋ] 的字母 x,而进入 19 世纪,学者们则更多的使用英语中常见的 sh。声母如此,韵母亦是如此。从附表可见,以马礼逊和卫三畏为代表的英美汉学家,在处理我们现代拼音中的介音 u 时,更喜欢使用字母 w,而这种将 w 放置于辅音后来表示 [u] 的情况在英语中很常见的。另外,汉语中的辅音韵尾 [-ŋ],19 世纪以前的注音方案中大都是用 m 来表示。在当时,汉语中的闭口韵尾 [-m] 已经逐渐并入 [-n] (叶宝奎 2001),选择 m 表示 [-ŋ] 也主要是因为罗曼语族中没有用 ng 作为韵尾的情况。而 19 世纪以后的汉学家,则大量开始使用 ng 作为韵尾表示 [-ŋ],直到今天的汉语拼音亦是如此。

使用语言的转变,背后也有着较深的根源,与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合。16 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的进行海外扩张。在亚洲地区,葡萄牙的势力更加强大。然而,16 世纪和 17 世纪卷入王朝战争和宗教战争,致使西葡两国走向衰落,尤其是宗教上的动荡,对当时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汉学家打击更为致命,加之在中国本土朝廷和教会的矛盾不断激化,内忧外患的局面造成了 18 世纪汉语研究的低谷。另一方面,西北欧国家英国、法国等自 1600 年起开始逐步赶超西班牙、葡萄牙,在 1763 年以后建立了世界的霸权,成为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汉学研究中心也随之从意大利转移到了法国,因而,这种流行语言上产生转变也不难理解了。

(二) 注音系统与官话基础方言的转化

注音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中走向成熟。最初的注音方案并没有定型,出现了很多一音多号或者多音一号的情况,如罗明坚系统中存在 c 表示 [k]、[k']、[x],g 表示 [x]、[ʔ] 的多音一号以及 c 和 g 都能表示 [x] 的一音多号的情况 (杨福绵 1995)。随着对注音系统认识的推进,西方汉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一音多号和多音一号的不科学性。从金尼阁开始,这两种现象就逐渐减少。到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进一步整合了前人的注音方案中不规整的地方,已经可以做到了一音一号的这种对应。而声调、送气等符号的变迁,也反映了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最初没有声调符号和送气符号,到利玛窦、金尼阁等人开始选定并使用这些符号,并且制定了能详细区分音位变体的中音符号、次音符号等,再到后来的作品中,删繁就简地只保留更能区分意义的声调和送气符号,也是西方汉学家对汉语注音的一个从无到有、从繁到简的发展进步。

最后,他们所记录的语言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从罗明坚、利玛窦起,到马礼逊、卫三畏,记录“官话”均为南京官话^⑤,而直到 1867 年威妥玛《语言自述集》才明确表示以北京官话为基础 (张卫东 1998)。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当时官话从南到北转移的一个过程,也在另一方面体现了西方汉学家们对当时汉语认知的一个演进过程。当然,300 余年的时间里,即使同样一种语言,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因而不同时期的汉学家们记录同一样的一门官话,也是有所差异的。通过研究不同的注音方案,是了解当时汉语读音演变的重要依据,更是解答传统音韵学中难以详细确定的一些音的出现和消亡提供了直观证据。如官话中闭口韵的消失、尖团音等情况。同时也要注意的,早期的汉学家虽然大都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并非专业的语言学家,他们为汉语设计的注音方案并不能保证完全精确地反映当时的语言状况。他们自身掌握的语言,也会在注音汉语的时候造成负迁移。马礼逊就指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日耳曼人,不同国家的人设计的注音方案就会有所不同,会带有他们母语的特征 (马礼逊 2008)。

四、结语

欧洲汉学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组成,16 世纪以来,以利玛窦、金尼阁、马礼逊、卫三畏



等传教士为代表的汉学家们不断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传教士们成为最早掌握汉语的欧洲人，300余年的时间，西方人为成功掌握汉语不懈的努力着。对西方的传教士而言，与他们的语言相比，汉语展示出非常特殊卓异的一面，他们无形中将西方语言的描写方法运用到汉语语音上，为汉语的注音系统与拼音化方案提供了新的描写向度，向欧洲介绍了汉语的语音特征，提出的有关汉语语音的观点与方法，至今依然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如果回归到语言学史角度，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对汉语注音体系的架构及其来龙去脉，进一步考察汉语的语音特征。对汉语研究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度与切入点。

当然，除了文中所涉，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汉学家远不止此。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资料也被发现，很多我们曾经忽视的汉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其价值也渐渐获得认可。本文只是基于汉语注音方案做了一下简单的梳理，事实上每一位汉学家和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专题研究，也可以为汉语语音特征研究提供汉学的观照。

附表：主要注音系统声韵表

	罗明坚系统	利玛窦系统	金尼阁系统	马礼逊系统	卫三畏系统
声母	p m f t n l c ch q h g sch Ç Çc z ss s sc ng ngh gn v u cc	c c' Ç Ç' f g h j k k' l m n p p' q q' s t t' v x ch ch' ng nh	c 'Ç ch 'ch k 'k p 'p t 't j v f g l m n s x h	ch ch' f g h j k k' l l' m m' n n' p p' s s' sz sh sh' t t' ts ts'	p 'p m f t tw t' tw' n nw l lw ch chw ch' chw' sh shw j jw ts tsw ts' tsw' s sw y k kw k' kw' hw h w ng
韵母	i y ij u iu a ia ua e ie ie' e' o io uo iuo ai ay iai uai uei uej ui uj au iau eu ieu an ian ien uan oan on uon iuon en uen in un iun am iam uam um ium	a e i o u ai ao eu ia ie io iu oa oo oe ui uo eao iai iao iue ieu oei uai uei am an em en im in um eam iam ien yum iun oam oem uam uen uon iuen lh	a e i o u ai ao am an eu em en ia ie io iu im in oa oe ua ue ui uo ul um un eao eam iai iao iam ieu ien iue ium iun oai oei oam oan oen uai uei uam uan uem uen uon iuen	a ä ae aou ay an ang än äng e ë ea eä eae eaou eay ëë ëen eö eu euë ei ew eang eung en eun eih eüh euen in ing ih o oo ow ö uy un ung uen urh uë uh wuy wüy wo wö wei wa wae wä wan wän wang wäng wüh ze	a ah an än ang äng ao ë eh éi en eu i ia iai iang iao ieh ien ih in ing ioh iu iün iüng o oh sz' u ü üé üéh üén uh üh ui un ung
声调符号、 送气符号等	无声调和送气符号，有入声符号'	用 ^ ^ ^ ^ 表示阴上去入，有送气符号 c 和次音符号 •	同利玛窦系统，另有中音符号 •	用 ^ ^ 表示平上去，入声单独成韵，用 c 表送气	c 的不同位置表示八个不同音，送气符号'

注：本表中的罗明坚系统参考自陈辉（2007），利玛窦和金尼阁系统参考自罗常培（2004），卫三畏参考自昌梅香（2013）。

注释

①范礼安神父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沙勿略之后，罗明坚之前来到中国，认为在华传教需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并要求传教士们学习中文。虽然他在研究汉语上没有专著问世，但无疑他对后来的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影响非凡，也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奠定了基础。

②《西儒耳目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的一部关于汉语的韵书，在后文会有更多的介绍。

③利玛窦和其他几位传教士编著《西字奇迹》后，赠予制墨大师程大约，而后程大约将《西字奇迹》编入自己的墨模雕刻图谱集《程氏墨苑》。

④《宾主问答私拟》原名 Pin ciù ven tà ssi gni, 关于注音和译名的考证参考陈辉（2007），第 158 页 -159 页。

⑤利玛窦和郭居静 1598 年合作编写了一部汉欧字典，但现已失传。事实上，如果该字典得以现世，较之《西字奇迹》中仅出现了几百个汉字的注音，该部字典应该成为“利玛窦系统”最主要的载体。

⑥杨福绵教授认为，罗明坚之所以没有标注送气符号和声调，并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而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标注方式。谭慧颖（2008）则认为也可能是罗明坚当时并不能很好的分辨汉语的五声。

⑦利玛窦（1986）提到“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神父们选定了五个音标，使学生一看就知道该是哪个音。中国字共有五音。郭居静神父在这方面贡献很大，他是位音乐家，音感灵敏”。另外，这段也可以明确证明了上文提到利玛窦和郭居静确实合编了一部字典，并在这部字典中就加入了送气符号和声调符号。

⑧金尼阁的国籍问题较复杂，可参考计翔翔（1997）。

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刻制于初唐年间的石碑，记录着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景教传教的情况，于 1623 年出土。卜弥格对石碑的注音和翻译的手稿生前没有发表，直到 1667 年德国学者基歇尔出版《中国图说》时才得以公布于世。

⑩《华语官话语法》出版于 1703 年，但事实上完成于 1682 年。作者万济国 1627 年出生，于 1687 年去世，所以这部作品应该算作 18 世纪的作品，而非 19 世纪。

⑪关于这些汉学家和他们著作以及注音方案的声韵拼合表以及继承，董海樱（2011）有十分详细的讲解。

⑫ 1616 年礼部侍郎沈惟启奏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导致一些传教士被捕或被杀，后平息。

⑬ 18 世纪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著作《汉语札记》在研究汉语语法上比较重要，但是在语音领域没有太大突破。

⑭《五车韵府》为明末陈苴谟所著中文韵书，有人认为马礼逊的《五车韵府》以陈为蓝本，而据杨慧玲（2012）考证，马礼逊的《五车韵府》以《康熙字典》为蓝本，而只摘取了陈苴谟《五车韵府》的名字。

⑮关于这些汉学家们所记录的南京官话，已经有很多学者论证过。上文提到的周有光先生 1960 年发表的文章中便提及马礼逊所记录的是南京官话，而利玛窦、金尼阁等人亦是如此。另外鲁国尧（2007）也有较详细的论述。

参考文献

- 董海樱《16 世纪至 19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 杨慧玲《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谱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姚小平《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卫匡国《中国文法》，白佐良、白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孔陈焱《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卡萨齐、莎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学林出版社，2011
- 周有光《马礼逊的〈中文字典〉和官话拼音方案——拼音史料笔记之一》，《中国语文》1960 年第 1 期
- 马礼逊《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华英字典》，大象出版社，2008
- 谭树林《〈华英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1 期
- 宋均芬《简评汉字注音的前世今生》，《汉字文化》2013 年第 5 期
-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
-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商务印书馆，1995
-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译，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王力《古代汉语》文字献疑

郭殿忱

古今字献疑

汉字的产生是个自然的过程。而汉字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其规范化,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既包括书体的演变:从甲骨文、钟鼎文(金文)、籀文、篆文到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亦包括字形的演变:即字与字之间的转注、假借、古今、正异、繁简等关系。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以下简称教材)对后三者,于“通论(六)”中专门有一节加以论述。本文仅就古今字问题略陈己见,求教于读者方家。

一、关于古今字的定义

教材没有直接界定古今字的内涵和外延,而是在例说“债责”、“捨舍”两组例字后写道:“由此看来,‘责’、‘舍’等是较古的字,‘债’、‘捨’等是比较后起的字,我们可以把‘债债’、‘舍捨’等称为古今字。”

此前,清代学者段玉裁在注《说文》时曾写道:“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

教材问世后,当代学者裘锡圭在其所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云:“‘古

今字’也是跟一词多形现象有关的一个术语。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通行时间往往有前有后。在前者就是后者的古字,在后者就是前者的今字。”乍看三种表述颇为相似,然而认真分析各举的例字,见仁见智就各有千秋了。先看段注的例字“谊”:“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仁义字也。”而教材在《汉书·霍光传》的注释中则云:“谊,通义。”为了说明此略语“通”的含义,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文选部分《晋灵公不君》的注释,在教材一版中“辟避”、“孰熟”、“闕缺”、“田畋”、“竟境”、“反返”、“诒贻”之间,一律用略语“同”作解。而教材修订本(二版)只保留了“反,同返”一组之略语“同”。“闕缺”、“诒贻”二组已变为“闕,通缺”,“诒,通贻”。其余四组一律改成“后来写作”:避、熟、畋、境。待校订重排本(三版)“反返”一组之“同”也改为:“反,后来写作返”了。王力先生仙逝后出版的《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凡例有云:“同”一般用于异体字。“通”用于通假字。当代学者所编工具书(夏启良、暴拯群编《通假字典》河南大学

计翔翔《明末在华传教士金尼阁墓志考》,《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罗常培《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4

孟庆波、刘彩艳《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昌梅香《〈汉英韵府〉拼音系统评介》,《辞书研究》2013年第4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语言科学》2007年第2期

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通讯地址:361102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